

不一樣的戰爭記錄

——宋崇書《抗美援朝日記》解讀

● 李文力

時值朝鮮戰爭爆發七十周年，中國、北朝鮮、南韓三國紛紛舉行相關紀念活動^①。七十年前的6月25日，朝鮮人民軍在蘇聯默許下向南韓進攻，歷時約三年的朝鮮戰爭爆發。9月15日，聯合國軍發動仁川登陸後，朝鮮人民軍一路敗退，幾近崩潰。10月8日，毛澤東命令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援助岌岌可危的北朝鮮政權^②，19日，第一批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戰爭前線。志願軍入朝作戰後，在黨和政府宣導和運作下，以巴金、路翎、魏巍、宋之的、陸柱國為代表的一批文人作家奔赴朝鮮戰場實地取材，上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文學的集體性創作熱潮自此開始。到後來，一些百戰餘生的志願軍官兵也加入到寫作的熱潮中，開始對戰場上發生的難忘之事進行紀實性書寫^③。時至今日，在文學創作領域，以歌頌志願軍英雄為主題的作品難以估量且名作迭出，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軍旅作

家魏巍所創作的〈誰是最可愛的人〉^④。然而，這類抗美援朝文學作品可以說是中共強化朝鮮戰爭動員宣傳和進行意識形態渲染的產物，「它具有戰爭文學所共有的特徵：歌頌英雄主義，塑造英雄形象，鞭笞敵軍的兇惡與殘暴等等」^⑤。作品所傳達給世人的是一種近乎「高、大、全」式志願軍英雄戰士的形象：忠黨愛國、英勇鬥爭、不畏強暴、捨生忘死、捨己為人。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歸國志願軍戰俘」這一特殊群體的坎坷經歷及其遭受的不公待遇開始引起人們關注，出現了若干紀實文學作品^⑥，進而打破了世人對志願軍群體形象的僵化認知。但沈志華認為這些作品「不過多是單純依據採訪或回憶史寫成的紀實作品，真正的學術研究尚未開始」^⑦。近些年來，已經有相關學術成果問世，如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常成的著作《被劫持的戰爭：志願軍戰俘與韓戰》（*The Hijacked*

* 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朱敏翎小姐對拙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對本人極有啟發，在此表示衷心感謝。惟文責自負。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就很好地彌補了關於「志願軍戰俘」學術研究的空白^⑥。至於對朝鮮戰爭進行「原生態記錄」的日記，有別於經過特殊雕琢的抗美援朝文學作品，從而呈現出不一樣的戰爭敘事，突顯其史料價值。筆者偶然發現的這本《抗美援朝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引用只註頁碼)便是這樣的作品^⑦。

《日記》作者宋崇書在入朝參戰期間擔任志願軍基層部隊排長。志願軍本是由人民解放軍改編而來，基層部隊官兵多出身農村。建國初期，全國人口約5.4億，文盲率高達80%，農村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5%以上^⑧，志願軍基層部隊的識字率可想而知，能夠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中堅持不懈記日記的官兵屬鳳毛麟角，而那些留存至今並得以付梓的「抗美援朝日記」更稱得上是吉光片羽。眾所周知，日記的史料價值往往高於事後的回憶。因此，比起許多倖存的志願軍老戰士留下來的關於朝鮮戰爭的回憶錄或口述史料，一本「抗美援朝日記」的史料價值顯得彌足珍貴。而基層幹部宋崇書敏感心細，他在《日記》中較為完整地記錄所在基層部隊接受「抗美援朝」思想動員的過程，捕捉到了部隊思想心態在接受動員前後的起伏變化，這是其他「抗美援朝日記」中所罕見的^⑨。

更引人注目的是，宋崇書的日記中對志願軍基層部隊的真實記錄具有普遍意義，有助於豐富我們對志願軍基層部隊的認知。本文就是在利用宋崇書《日記》的基礎上，借助相關官方檔案文獻和若干回憶錄對這本日記中的重要內容進行解讀，希冀以此視角展現出志願軍基層部隊對「入朝

參戰」的最初心態反應、接受「抗美援朝」思想動員的過程，以及思想心態上的波動起伏。文末將延伸敘述志願軍中不同群體對「入朝參戰」的各色反應，並指出在當時的形勢環境下，無論志願與否，他們並無選擇的餘地。

一 宋崇書和《抗美援朝日記》

宋崇書，男，漢族，1926年11月5日(農曆十月初一)出生於貴州省郎岱縣(今六盤水市六枝特區)岩腳鎮確窩沖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少年時在本村上過私塾，1947年就讀於普定縣建國中學；初中未畢業就與王永武、喻忠誠等人研究組織發展了「反蔣」武裝游擊隊，任一分隊隊長(〈作者小傳〉，無頁碼)。1949年3月3日，宋崇書與王永武率領游擊隊準備參加由中共貴州省工委組織領導的攻取郎岱城的「三三暴動」，因在行軍途中得知暴動失利，二人遂將游擊隊轉移到安全地帶進行隱秘活動^⑩。1950年1月14日，宋、王率領的游擊武裝二百餘人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第5兵團17軍49師146團，宋崇書任8連1排排長，隨即投身到郎岱解放初期的「剿匪」鬥爭中^⑪。

1951年1月4日，西南軍區電令貴州軍區16軍及186師於3月前集結待命，準備入朝作戰^⑫。同年2月，為兼顧「抗美援朝」和「貴州剿匪」兩項任務，西南軍區對轄區部隊建制作出調整，調17軍49師146團入16軍47師，待命入朝；而16軍47師141團則調入17軍49師，留守貴州畢節^⑬。經過此次對調後，宋崇書所在部隊的

番號變更為16軍47師146團(頁19)。其後，146團與141團的番號對改^⑥。經過此輪對調對改後，宋崇書所在部隊番號由最初的17軍49師146團變更為16軍47師141團。

3月10日，貴州軍區對16軍發出開進令，全軍分三路由貴州出發向朝鮮進軍^⑦。7月10日拂曉，宋崇書隨部隊由遼寧安東(今丹東)坐火車跨過鴨綠江到達朝鮮新義州市(頁59)^⑧。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6軍改稱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6軍^⑨，宋所在部隊隨之變更為志願軍。1952年初，宋崇書被抽調回國參加軍官教導團學習三年，畢業後歷任東北守備3師司令部參謀，中國人民解放軍191師126團作訓股長、團副參謀長、副團長等職(〈作者小傳〉)。

宋崇書的《日記》記錄的時間跨度從1951年1月1日至1952年12月31日，每日皆有一記錄，未曾中斷。其中1951年1月1日至7月10日記錄的是作者及其所在部隊入朝作戰前的準備階段，7月11日至12月20日記錄的是在朝參戰階段；而1951年12月21日至次年12月31日記錄的主要是作者歸國後的軍旅生活，與朝鮮戰爭關係不大，故不在筆者論述範圍內。正是宋崇書堅持不懈、無間斷地記錄，為後人展現出一個志願軍普通基層幹部及其所在部隊從戰前準備到入朝作戰的完整過程，凸顯出《日記》的史料價值。

二 基層部隊對「入朝參戰」的最初態度

1951年1月初，抗美援朝戰爭第三次戰役已經接近尾聲，國內也正在

如火如荼地開展全民性的「抗美援朝」時事宣傳和思想教育運動^⑩，全國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廣播全力投入到宣傳運動中，輔之以標語口號宣傳^⑪。然而，宋崇書在1月1日至27日的日記中未曾留下有關「抗美援朝」的隻言片語。直到28日，作為「剿匪」功臣代表之一的宋崇書前往軍分區參加年終總結表彰大會，在聆聽了「司令員報告當前的時事問題」之後(頁8)，於28日、29日兩天的日記中才表露出入朝參戰的熱情，「經過這十多天的大會，我自己又提高了一步。小組討論後，我抱着最大的決心，寫了張請戰書，請求『抗美援朝』，「美帝是一隻紙老虎，終究是沒有好下場的。但是我們絕不能輕敵麻痹，紙老虎要當活老虎打，應當時時刻刻提高警惕，作好思想準備，戰鬥準備，才能克服一切，戰勝一切」(頁9)。

然而，宋崇書所在基層部隊的其他幹部未能有此榮幸參加軍分區的年終總結表彰大會以「提高思想認識」，在「入朝參戰」的問題上表現得較為冷漠。2月8日，宋崇書所在營部召開排以上幹部會議，並隨之檢查幹部的思想，作為8連1排排長的宋崇書在其後兩天的日記中分別寫道：「幹部檢查戰鬥意志、愛國主義思想，查出三種思想：1、想早點脫離貴州，嫌貴州山大生活苦；2、怕朝鮮氣候寒冷生活苦；3、部隊不活躍，足以證明有思想問題」，「分析昨天查出的三種思想的根源：1、是享樂；2、追起根來也就是怕死；3、不活躍的人，思想一定有大問題。分析以後再進行學習提高」(頁12)。

從此時《日記》所反映的幹部思想狀況來看，幾個月前黨中央號召的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尚未成為宋崇書所在基層部隊的共同呼聲。實際上，宋崇書所在營部幹部的思想心態並非個例。早在1950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發布文件稱：「據邊防軍的思想狀況報告，以及其他各部的整風初步總結，看出部隊中目前最危險的帶有普遍性的傾向，是嚴重的和平麻痹與戰鬥意志渙散」，「某些人且產生了可恥的厭戰、保命和不願執行艱苦任務的情緒。某些機關的領導上亦存在着片面性，致在生產、復員與文化教育等工作措施中，強調一面、放鬆另一面，忘記鞏固戰鬥隊的思想，以致部隊發生刀槍入庫、武器生鏽，半年不出操，戰士想回家結婚過日子，討厭軍事、應付政治、單純為學文化而學文化等等不良現象」^②。

總政治部文件中提到的邊防軍，是1950年7月13日，中央軍委為保衛東北邊境、必要時援助朝鮮人民軍作戰所組建的東北邊防軍，初成立時由四個軍和三個炮兵師共25.5萬餘人組成^③，10月8日，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作戰^④。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時曾回憶起東北邊防軍對入朝參戰的最初思想心態，稱「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戰士、幹部是積極的、願意打的。這是根據他們的調查」，可見，總政治部所說的「和平麻痹與戰鬥意志渙散」瀰漫在東北邊防軍百分之八十的官兵之中^⑤。

結合當時國內大環境來看，宋崇書所在部隊以及更早幾個月在東北邊防軍中瀰漫厭戰的思想，實屬人之常情。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解放軍的大部分部隊也剛剛從慘烈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走出

來，轉而擔負地方生產建設的任務，人心多思安定、求和平、言建設。解放軍第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就記得，即使在軍隊兵團一級的將領當中，「『革命成功了』，『可以歇一口氣的念頭』，在當時並不單單是個別同志的想法」^⑥。而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終作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略決策，打破了部隊剛由戰爭轉入訓練、生產，由動盪轉入相對安定的秩序^⑦。迅猛的形勢轉化難免讓人感到不知所措，加上部隊將要參加的是一場發生在異國的戰爭，對手中有世界上總體軍事實力最為強大的美軍。

10月25日，總政治部要求各部隊「於冬季深入進行保衛祖國、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教育，並聯繫當前形勢啟發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仇視，同情朝鮮人民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積極反抗，講清楚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性，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意志」^⑧。1951年2月中旬後，為了響應總政治部的號召，宋崇書所在部隊開始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思想動員，《日記》中關於「抗美援朝」的記錄也開始豐富起來。

三 入朝前的「抗美援朝」 思想動員

為了使黨中央發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號召深入人心，使全軍上上下下了解出國作戰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各志願軍部隊在向中朝邊境開進途中曾普遍進行了思想教育，「以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我們不能置之不理為中心內容，進行形勢和任務教育。在這一教育中，從美

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從中朝兩國的歷史友誼和地理關係上，反覆說明我軍出國作戰的必要性和正義性」^⑨。第一批入朝的東北邊防軍在入朝前進行的「抗美援朝」政治思想動員和教育的方式「多種多樣、不拘一格」，「或召開官兵大會，或進行小組和班排的討論，或搞壁報和黑板報宣傳，或到美國飛機轟炸現場參觀，或請朝鮮同志介紹情況，或聽朝鮮難民控訴美軍罪行。部隊還普遍進行了訴苦教育，開展『鄰居失火我們該怎麼辦的討論』」^⑩。

宋崇書所在部隊也不拘泥於單一的形式。1951年2月16日，他所在的8連「排演了兩個節目，1、『抗美援朝舞』；2、杜魯門吹噓原子彈的雙簧」（頁13）。到了3月2日至5日，8連1排的士兵就在排長宋崇書的主持和引導下連續四天開展控訴「美帝」罪行會。3月2日是控訴素材的準備階段，該排士兵在回憶個人及家庭的悲慘經歷時，機槍1班的士兵全部嚎啕大哭起來，也勾起了宋崇書「父親被地主汪俊夫逼死」的慘痛回憶，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總之，這些壞傢伙和美蔣特務是一樣。」3日，1排各班開展正式控訴，然後全部集中到連開展控訴「美帝」罪行大會，現場的景象可謂涕泗滂沱，「同志們在控訴的時候哭得肝腸欲斷，有的同志的家庭直接受到美帝的迫害、侮辱、姦淫等；有的受到國民黨匪幫的殘害；有的受到日本鬼子的殘害；有的同志的親人被地方上的土豪惡霸逼死、打死、殺死」，「很多新同志經過控訴大會後，咬破手指寫血書表決心，請求到朝鮮參戰」（頁17）。

如果說有的士兵個人及家庭確實受到「美帝」的「迫害、侮辱、姦淫」，

他們為報「血親之仇」要求赴朝打「美帝」尚屬情理之中。那麼大多數受到國民黨、日本帝國主義、家鄉土豪惡霸迫害的士兵與要求赴朝打「美帝」又有甚麼關聯呢？3月4日和5日，1排進行的「算公賬」和「找苦根」解決了這個更為關鍵的問題。前兩天的控訴會算的是私人「苦賬」，4日的「算公賬」則意在追問部隊究竟有多少人犧牲，「他們為的是誰？」、「是誰害死他們的？」控訴會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找來找去還是在美帝身上」，「不但現在而且從幾百年前就有侵略中國的野心計劃」（頁17）。5日早晨，連隊決定以排為單位分開「找苦根」，這次控訴會的主角是士兵夏玉剛和武林這兩位「典型人物」，夏玉剛談到家裏受盡地主剝削，由於糧食不夠吃才典當田地給地主，到期卻不讓贖回，父親去縣裏告狀的路上被地主殺害。武林談到了父親被國民黨殺害，並提出疑問：「國民黨時抓兵搶糧，亂殺無辜，為啥蔣介石置之不理。」這些士兵一層層地「追根」，「結果追到杜魯門的身上去，是他陰謀計劃，暗裏藏刀，造成中國人民數十年來的慘形」（頁18）。當天的控訴會包含着這樣的「邏輯」：蔣介石及其統治下國民黨、地主惡霸造成了士兵個人及家庭的苦難，而「美帝」是「蔣匪惡霸」的「後台老闆」，所以，苦難的根源最終可以追溯到「美帝」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身上。經過四天涕泗橫流的控訴「美帝」罪行會，士兵的「仇美愛國」情緒被激發出來，提出了「冤有頭，債有主，血債要用血來還」的口號，「決心踏着先烈的血迹前進，要向美帝討還血債！」（頁17-18）

不難看出，此次1排進行的控訴「美帝」罪行會，主要是從感性層面的

苦難宣洩作為突破口，在幹部的「循循善誘」下，讓士兵對活生生的個人或家庭苦難經歷進行「追根歸罪」。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解放軍進行的改造國民黨俘虜兵的新式整軍運動就是從大規模的「訴苦」運動開始的^①。彼時解放軍開展的「訴苦」運動「追根歸罪」的終點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此時志願軍「控訴」的「邏輯歸罪」的終點自然要落到「美帝」頭上，正如一名原志願軍戰士回憶抗美援朝片斷時所說的：「找苦源，挖苦根，最終找到美帝國主義身上去」，進而「就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去想、去做」^②。

四 思想動員的效果

經過一番戰前思想動員後，許多士兵在認識上跟上了黨的步伐，了解到出國作戰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不少志願軍部隊出現了紛紛要求出國參戰的熱烈情況。1950年9月，志願軍第13兵團經過兩個月的戰前思想教育，「部隊隨之出現了普遍報名參加志願軍的活動，要求支援友鄰出國作戰」的熱烈反應，該兵團一個叫陳德輝的戰士，向連隊幹部遞交了一份言辭懇切的請戰書：「趕快報告上級，我不能再等了，新仇舊恨我已無法忍受。我娘被地主逼死，父親給地主扛活累死，我12歲就給地主放豬，挨打受罵到16歲，又被國民黨抓了兵，要不是美國鬼子支持蔣介石，我們勞動人民怎麼會受這麼多苦，遭這麼多罪？現在我們勝利了，能看着朝鮮人民受苦不去管嗎？天下窮人是一家，我要求到朝鮮前線殺美國鬼子！」^③

1951年4月10日，志願軍47軍140師正駐紮在遼寧寬甸，該部隊將於兩天後入朝作戰，該師宣傳隊文藝戰士饒弘範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經過半年多抗美援朝教育和有針對性的『三視』（即仇視、鄙視、蔑視美國）教育，特別是學習先期入朝兄弟部隊一、二、三、四次戰役的作戰經驗和英雄事績，以及出發以來深入細緻的思想動員，廣大指戰員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大發揚，決心書、請戰書、火線入團入黨申請書如雪片飛到各級領導手中。『跨過鴨綠江，奔赴三八線，殺敵報國，打敗美帝』，成為全師上下的共同呼聲。而『抗美援朝不過江，保家衛國蹲後方』，在野戰部隊看來，卻是不那麼光彩的。」^④

然而，戰前思想動員之後出現的熱烈參戰要求在宋崇書的日記中並未過多呈現，他所記錄的更多是另外一番景象。從1951年3月2日到5日的日記中不難看出，控訴「美帝」罪行會在短時間內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很多新兵請求到朝鮮參戰。但是，控訴會的後續效果卻不盡人意，141團三號首長所說的「寫血書，按手印，可是到第二天就向後轉了」的戲劇性變化（頁25），在《日記》中接二連三地出現。

3月10日，即控訴會結束後的第五天，「營裏來了通知：第一營來了，全團集中在團部開晚會、看電影。今晚的電影是《中國人民的勝利》^⑤，當戰鬥激烈的時候，有好些新同志嚇得『媽呀，媽呀』的叫喊，電影放到中場的時候，營部發生逃亡事件」，宋崇書對該事件的看法是，「由此可見新同志是經不起考驗的」（頁19）。12日，負有對士兵進行思想教育之責

的幹部「檢查鬥志」，發現各個連隊的幹部「都有些毛包〔方言詞，含有「零亂不整潔」的意思；宋崇書使用這一詞意在說明部隊思想上的混亂〕思想，有右傾的，有地區觀念的，有家庭觀念的，也有怕苦的，享樂腐化的」，宋崇書認為這些思想包袱「終究還是一個恐懼思想，認為我們的肉體拼不過美帝的鋼鐵」（頁20）。15日，「團裏開始動員，在短時間內就要『抗美援朝』。部隊忽然起了很大的波動，思想狀況紊亂。有的想家，有的怕苦，有的怕死，有的貪圖享樂，有的怕美帝的鋼鐵戰爭」（頁21）。23日，「昨晚連續四小時練習集合動作，嚇壞了許多新同志，以為要去『抗美援朝』了。這些思想真成大問題了」（頁23）。

4月22日，宋崇書所在部隊向中朝邊境開進途中駐紮在河北衡水縣四區郭家村，在這裏訓練兩個半月後，於7月8日離開郭家村前往河北磨頭鎮乘坐火車，10日拂曉從安東坐火車跨過鴨綠江大橋，一路直抵朝鮮新義州市（頁58-59）。然而在出發前的6月22日，宋崇書所在部隊的思想又出現了波動，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午在課堂上，分隊副動員收集舊、壞的衣物等，引起了同志們思想上的波動。有的同志說：快了，很快就要去『抗美援朝』了。只要上級一動員，同時收交領發東西，時間就不會太久。還有的同志說：『有錢不花到朝鮮戰死了值不過。』部分同志說：『上級不讓洩露軍機，我們非寫封信回家不可。』這些思想，分析起來是相同的，都認為一到朝鮮戰場就永遠回不來了，沒有生路了，趕快把自己的衣服穿完，錢用完。有了這種

悲觀的思想，部隊還能取得勝利嗎？」（頁54-55）

面對這種悲觀的情緒，已調任為8連2排排長（頁22）的宋崇書只能不斷地做士兵的思想工作，「從昨天開始收交衣服，同志們就有了懷疑，認為快開走了同時考慮到生死問題，能否再回國回家鄉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斷產生，我就給同志們作思想工作。我們是革命青年，要確定革命的人生觀，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堅持『抗美援朝』的最後勝利，絕對不能顧慮生死影響自己的前途」（頁55）。1995年，年屆古稀的宋崇書對四十四年前所在部隊赴朝作戰時的思想狀況還存有很深的印象：「部隊進行戰前動員後，戰士們的思想波動很大，各種各樣的想法都有。有的說，這次入朝作戰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我連有三個膽小鬼聽到這些，幾天後神經就失常了。部隊在思想上經受着嚴峻的考驗。」^⑥

貪生畏死、安樂享逸本是人性之「痼疾」，即使是經歷了高強度的思想教育恐怕亦是難以被根除的。如志願軍戰地記者謝受康在日記中所說的：「每個人的思想癥結在哪裏？是怕死？怕美國軍隊的飛機、大炮？還是怕苦怕累？想家？想老婆、孩子？想戀人？怕殘廢？」^⑦在集體雄赳赳、氣昂昂地高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咬破手指寫血書表決心的背後，宋崇書在《日記》中所記錄的這些平凡的血肉之軀，面對即將參與的這場慘烈無情的戰爭，所呈現出來的更多是人性中柔弱的一面。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志願軍部隊中也有所反映。早在1950年11月22日，第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和政委李志

民正率領着兵團領導機關由陝西西安向山東兗州(今濟寧市兗州區)進發，剛到兗州幾天，二人便前往北京接受朱德總司令的召見^⑳。在中南海，李志民向朱德匯報部隊思想動態時稱：「部隊接到抗美援朝動員令後，經過形勢任務教育，士氣比較高漲，紛紛寫請戰書、決心書，個個簽名要求入朝參戰」，這句話雖然帶有誇張的成份，但至少反映的是形勢任務教育後部隊出現的熱烈要求參戰的情況。接着，李志民話鋒一轉：「但是，由於入朝參戰是第一次出國作戰，主要對手是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打的又是現代化立體戰爭，幹部戰士普遍心中無數；加之長期以來社會上崇美恐美思想的影響，部分同志特別是從國民黨軍隊中『解放』過來的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還存在恐美情緒，怕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坦克、原子彈，怕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㉑顯然，他對於形勢任務教育後出現的戰士「紛紛寫請戰書」、「個個簽名要求入朝參戰」的情況也是謹慎地看待，深知這一表象的背後還有着幹部戰士畏戰的另一面。

而一些思想包袱沉重的士兵在內心極度畏戰怕死的情況下，會將黨的思想教育拋諸腦後，選擇離隊脫逃。宋崇書在《日記》中時常表露出對這一問題的擔憂(頁21、30)，因為部隊出現了多起戰士甚至是基層幹部「開小差」的事件。如1951年3月23日，「中午機槍七連有兩位開小差的被抓回來開鬥爭大會，有一個麻子，他的罪行是嚴重的，他鼓動逃亡，還把兩枝槍偷走了」(頁23)。4月7日，「上午八點都到團部開公審大會，鎮壓反革命份子。槍斃的三個都是郎岱的，兩個是三區的，一個是五區張家

寨的趙國良，以上三個的罪行是組織逃亡，拐帶武器逃跑，部隊屢教不改，繼續破壞」(頁29)。後來，團裏舉行「抗美援朝出征誓師大會」後不久便發生了9連副政治指導員張明珠私自離隊的事件，宋崇書對此感到惋惜：「這個同志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一失足以千古恨』。可是共產黨員也不完全是這樣的，只要你能有錯必改，一樣的有前途。」(頁30)7月9日，宋崇書屬下的山東籍副排長在部隊火車經過山海關之時，藉停車吃飯之機「不辭而別」^㉒，「給同志們很壞的影響」(頁59)。

志願軍歸國戰俘饒加福在1954年5月8日寫下的一份自述，完整地敘述了為何離隊脫逃的內心想法，或可作為對照。饒加福是江西弋陽人，1951年4月入伍的新兵，6月入朝作戰。當月28日，他懷揣美軍宣傳品，離隊向美軍投降，當年十八歲；後因不堪戰俘營的非人生活，於1953年9月14日清晨，在中立區翻鐵絲網回國。下面是其自述的摘錄^㉓：

1951年6月27日，我到山溝裏去打柴，看到敵人的宣傳品，上面寫着：「同志們，你們過來吧。我們用汽車把你們送到後防(方)去休息，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保證投降過來與聯軍一樣看待，有好衣服穿。不要再替蘇聯賣命(，)家中的父母妻子都在希望你們回家。」看到後，自己的思想就動搖了。相信了敵人說的話，而不相信黨和上級的話。

28日晚上，部隊在挖工事，班長叫我拿機槍子彈時，我就走在班長的後面。我看到班長走遠了，就把武器彈藥放在防空洞。我穿一件大衣，拿一件雨衣、一頂文(蚊)帳、一雙

鞋子，從山溝裏投降敵人去了。在29日早上碰到美國鬼子，因說話不懂，我就掏出傳單給他看，他就用吉普車把我送到後方的敵軍指揮部。

在指揮部，有兩個會說中國話的(人)問我：

……

「為甚麼要投降？」

我說看到聯(合國)軍(的)傳單，自己害怕死，不願(意)打仗，怕吃苦而投降。

總之，一番戰前思想動員下來，究竟在士兵中間能達到何種效果，這裏要打上大大的問號。思想動員也許能在士兵腦海中形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邏輯鏈條，卻無法根除人性共有的弱點。或許，在集體鬥志激昂地高喊口號的背後，存在着相當一批有心無膽的潛在脫逃者^②。

五 略感失落的參戰經歷

1951年7月5日，宋崇書所在部隊的營黨委決定，要求各連2排出征參加抗美援朝，這實現了他希望到朝鮮戰場立功的「夙願」(頁58)。可惜天不盡遂人意，宋崇書雖然實現了赴朝參戰的願望，但並未有太多建立戰功的機會，這段赴朝參戰的經歷讓他感到有些失落。

如前所述，宋崇書隨大部隊於7月10日進入朝鮮新義州。11日，部隊隱蔽在新義州南面的山林地帶，後由朝鮮人民軍派人帶路到各單位去^③。12日之後，為了減少美軍空襲造成的傷亡，宋崇書所在部隊採取夜行軍的方式，經過九天的艱難步行才抵達朝鮮新溪，一路上看到的景象令

人目不忍視，「夜間經過的許多小城市，都被美國鬼子炸得不成樣子。敵機一晚到亮進行轟炸，部隊人太多，一面注意防空一面行軍，亂得一點秩序也沒有」，「經過戰爭摧殘的地區簡直慘不忍睹。昨晚通過的一些地區，陣亡同志的墳堆如山，沿途有不少朝鮮人民的工廠被炸壞了」(頁60、61)。

宋崇書領導的2排戰士是「多半沒有經過戰鬥鍛煉」的新兵(頁71)，在行軍過程中平均每名戰士負重六七十斤，而一些幹部卻未能做到與士兵同甘共苦、體恤士卒。宋崇書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很多年紀小的戰士承受不了，只是哭。帶隊幹部不知道戰士的痛苦，因為他們身上沒有分厘東西，所以只管埋頭拉起走」，「夜行軍到了相當疲勞的時候，才增加重量，又不讓休息。同志們支持不住就大哭，講了不少怪話：『帶隊的不是人養的，拿當兵的如牛馬一樣對待。』」(頁60-61)由於2排在這次長途跋涉的行軍最落後，宋崇書對此作了一番檢討：「今天黨小組長和副排級以上的幹部在一塊總結經驗教訓。發現有三方面的問題：1、有反抗情緒；2、掉隊，3、病號多。出現這些問題，我要負一定的責任……」(頁62)

或許正是兵員戰鬥力不高、表現不佳，接下來在朝鮮的日子裏，2排從事的主要工作「不是挖防空洞，就是防空」(頁71)，而非在前線作戰。而隔壁1排士兵卻「一連好幾個月在外執行任務，他們在敵人心臟裏穿插，在敵人的炮火裏活動」(頁85-86)，宋崇書對此感到有些失落，「過去在老部隊輝煌了一段時間，各級首長非常重視，隨時把我當作典型來推動工作。現在和以前完全相反」。些

許失落之餘，他也不忘自我安慰和勉勵，「從我的工作看，仍是和從前一樣，沒有甚麼阻力。我也不希望別人看得起，自己不願意與別人爭功，工作老老實實地幹。可有些同志卻常說，他們如何如何，我們怎樣怎樣等。我覺得對此要加強教育」（頁75）。2排的個別士兵對這種受到上級「冷落」的境遇也發出了「牢騷」：「我要回一排參加執行主要任務去。」（頁77）

2排在後方主要從事次要任務的狀況持續到11月，此後該排上前線作戰或偵察的機會增多，卻無緣擔任主攻部隊；宋崇書更多是耳聞兄弟部隊「重傷不下火線」的英勇感人事迹（頁92）。11月4日，他所在的141團轉移陣地至馬良山一帶，該團作為輔助部隊正配合志願軍64軍191師發動馬良山反擊戰，而2排的主要任務是「在主攻部隊左邊河岸的小山頭上阻擊逃跑的敵人」和「留下打掃戰場」^④。9日，2排從馬良山陣地中撤出。11月底，宋崇書將要作為骨幹被抽調回國轉入軍官教導團培養深造，他也開始準備回國的事務。12月1日，他跟隨軍官教導團啟程返國，一路走走停停，最終於21日抵達遼寧安東，其朝鮮戰爭經歷正式畫上句號。

六 結語

從宋崇書《日記》反映的情況來看，其所在部隊的基層官兵在對待「入朝參戰」的問題上並未自發形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統一認識，並且在思想上表現為「和平麻痹與戰鬥意志渙散」。這一思想狀況同樣出

現在第一批入朝的東北邊防軍身上，也折射着剛從國共內戰中走出來的解放軍大部分部隊希望「解甲歸田」的願望。實際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對待「入朝參戰」這一問題的最初態度上，除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幾乎所有領導人都對現在出兵朝鮮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而最重要的是軍隊領導人幾乎一致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有把握」^⑤。在經過一番艱難曲折的決策過程後，毛澤東於1950年10月18日才最終下定決心出兵援朝^⑥。

中共作為「以俄為師」的列寧式政黨，其在軍隊建設方面亦是師法蘇俄紅軍，「大體而言，乃將嚴密的黨組織細胞置入軍隊的各級系統之中，以保證軍隊絕對服從於黨的組織權威和意識形態權威」。因此，中共領導下的武裝力量與傳統舊軍隊相比，「一具有嚴密的組織性，二具有濃烈的意識形態信仰」^⑦。為了使黨中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深入人心，以確保軍隊在思想上緊跟黨的步伐，入朝前各志願軍部隊勢必要進行一場「抗美援朝」思想動員。當時宋崇書所在的基層部隊所進行的思想動員主要是開展控訴「美帝」罪行會，控訴會看似在短時間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實則後續效果不佳；基層部隊中一些士兵對「入朝參戰」有所畏懼，一些內心極度畏戰怕死的士兵則離隊脫逃。這種在戰爭高壓狀態下所浮現出的人性中柔弱的一面，在其他志願軍部隊中也有所體現。

那麼，在對「入朝參戰」的最初態度上，志願軍部隊中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參與這場戰爭的呢？在經歷了「抗美援朝」思想動員之後，又有多少人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稱

東北邊防軍「……動員之後，他們作了一個調查，說有百分之二十的戰士、幹部是願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願意打的」，「除了這百分之四十，還有百分之六十，是打也可以，不打可以，隨大流」^{④8}。這是一個相對可信的參考數據。實際上，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參與這場戰爭，又有多少人是迫於政治壓力「寫血書，按手印」或表示「隨大流」，我們無法、也不可能進行具體的統計。具備健全常識的人很容易想到：對於解放軍老兵而言，大多數人是憧憬着回家過上「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和平、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會希望去參與一場發生在異國的戰爭，保衛一群原本「毫不相干」的朝鮮人民呢？

但值得注意的是，志願軍部隊兵員構成較為複雜，曾在朝鮮戰場進行過三個月戰地採訪的軍旅作家魏巍就回憶道：「跟我談的，有指揮員、戰鬥英雄、一般的戰士、幹部、新參軍的學生和過去曾經是落後的人。」^{④9}這些形形色色的子群體由於出身階級、年齡、人生經歷、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異，他們對「入朝參戰」的最初認識，以及對「抗美援朝」思想動員的心態反應顯然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對於同樣是「過去曾經是落後的人」（主要指國民黨士兵）^{⑤0}，楊奎松閱讀美軍繳獲的志願軍第26、27軍在作戰中遺失的大量檔案文件、士兵家信日記後，認為中共善於做士兵工作，一些窮苦農民出身的原國民黨士兵在解放軍中獲得較好的待遇，部隊思想教育成風，加之親人作為軍屬被地方政府優待照顧，因而不少原國民黨士兵思想已發生轉變，對中共表現出服從和效忠，在「抗美援朝」問題

上「追求進步，表現勇敢」^{⑤1}；而常成則注意到志願軍中就有一批對中共心存芥蒂的原國民黨士兵，對入朝參戰反而「翹首以盼」，因為這是他們眼中脫離中共統治、重新投奔國民黨的天賜良機^{⑤2}。

此外，在志願軍補充的新兵隊伍中^{⑤3}，許多青少年是在當時「抗美援朝」時事宣傳動員的鼓動下，被激起志願赴朝參戰的熱血與激情。1950年11月初，廣州各界掀起了請求入朝參戰的熱潮，僅南方大學到11月12日就收到1,200份學生要求赴朝參戰的志願書^{⑤4}。「革命英雄主義」對於許多熱血方剛的青少年來說有着無窮的魅力。1950年底，南京大學附中初三丙班的學生程幹遠，時年十四歲，受到蘇聯革命題材的書籍和電影的影響，感到「自己好像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戰士，身上好像有用之不盡的革命激情和充沛精力，連走路都帶着歡快的小跑」^{⑤5}。他被周圍同學志願參軍響應抗美援朝的熱情所感染，心情無法平復，恨不得馬上穿上軍裝赴朝作戰，不惜虛報年齡參加「軍幹校」^{⑤6}，最後如願以償成為志願軍炮7師運輸連的一名駕駛兵^{⑤7}。

總之，志願軍隊伍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子群體，他們對「入朝參戰」的心態反應顯然不能等量齊觀。本文透過宋崇書的《日記》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相對普遍的現象。但是，無論對「入朝參戰」持何種態度，志願軍部隊在入朝前普遍開展的「抗美援朝」思想動員均以「強制參與、無退出機制為特色」^{⑤8}，官兵在接受思想動員的「洗禮」後，除了「寫血書，按手印」、高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外，已別無選擇。加之中共建政初期就對新聞媒體進行了嚴密的控制，國內大小

新聞媒體開足馬力進行鋪天蓋地的「抗美援朝」時事宣傳，民眾所能獲取的資訊內容與中共中央所要傳達的精神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在這樣的形勢環境下，若非逃出「紅色中國」，他們只能為「黨中央的意志決策」裹挾而行，最終被捲入到這場肝髓流野、九死一生的戰爭中去。

註釋

① 在本文中，「朝鮮戰爭」即「韓戰」，「北朝鮮」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韓」指「大韓民國」。

②③ 〈軍委主席毛澤東關於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418。

④ 如《志願軍一日》便是此類作品。該書「所呈現出的一百多萬字的『志願軍一日』是從在部隊中經過了逐級的嚴格挑選後，送到編輯委員會的一萬三千六百多篇，合計兩千萬字以上的作品中，最後挑選出來的」。參見郭沫若：〈序「志願軍一日」〉（1956年6月22日），載《志願軍一日》編輯委員會編：《志願軍一日》（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頁4。

⑤ 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人民日報》，1951年4月11日，第1版。

⑥ 閻麗娜：〈抗美援朝文學研究——以1950年代《解放軍文藝》為個案〉（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1），「摘要」。

⑦ 就筆者目力所及，這類作品有大鷹：《志願軍戰俘紀事》（北京：崑崙出版社，1987）；于勁：《厄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8）；賀明：《忠誠：志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張澤石等編：《考驗：志願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8）；程來儀：《正義與邪惡的較量——

朝鮮戰爭戰俘之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高延賽、張城垣：《重圍：志願軍一八零師代政委吳成德與戰友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

⑧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17。

⑨ 參見 David C. Chang,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此外，另有其他學者關注志願軍戰俘問題，如 Pingchao Zhu, “‘Disgraced Soldiers’: The Ordeal of the Repatriated POWs of the Chinese Volunteer Army from the Korean War”,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4, no. 2 (2015): 162-200。

⑩ 宋崇書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六枝特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抗美援朝日記》（六枝：內部資料，1995）。

⑪ 董渭川：《新中國的新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51），頁86；淺井加葉子著，王國勳、劉岳斌譯：《當代中國掃盲考察》（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頁1。

⑫ 就筆者目力所及，已付梓面世的「抗美援朝日記」還有：（1）志願軍中高級幹部的日記，如陳賡：《陳賡日記（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鄭文翰：《鄭文翰日記：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951.4.10-1953.7.2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薛劍強：《為了永久和平與幸福》（北京：長征出版社，2000）；李鐘玄：《李鐘玄戰鬥日記》（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周克玉：《戰地雪泥：抗美援朝日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8）。（2）普通士兵的日記，如饒弘範：《抗美援朝戰地日記》（丹東：滿族文學雜誌社，1997）；張恩儒：《昨日硝煙——一個志願軍報務員在朝鮮的日記》（北京：華齡出版社，2001）；陳興九：《朝鮮戰場一千天》（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3）隨軍新聞工作者的日記，如華山：《朝鮮戰場日記》

(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謝受康：《和平之神：一個志願軍的戰地日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李莊：《李莊朝鮮戰地日記》(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徐光耀：《陽光·炮彈·未婚妻：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⑫⑬ 六枝特區史志辦公室：《中國共產黨六枝特區歷史》，第一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頁44；50。

⑭⑮⑯ 貴州省軍區黨史辦公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兵團暨貴州軍區戰史》(貴陽：內部發行，1991)，頁356。

⑰ 王永林：〈王永林回憶錄〉，載胡長斌、游平偉主編：《大風歌：遵義市離休幹部回憶錄》，第一卷(遵義：遵義市離退休幹部工作局，2011)，頁195；中共黔東南州委黨史研究室主編：《西進支隊解放黔東南人員名錄》(黔東南自治州：內部資料，1999)，頁301。

⑱ 按照宋崇書的日記記錄，其所屬的47師141團在1951年7月10日已經由安東渡江進入朝鮮境內，這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歷史上的27個軍》一書中所敘述的時間、地點有所出入，該書稱：「〔1951年〕9月14日，第47師奉命先行入朝。24日至26日，由輯安渡江。」參見張明金、劉立勤主編：《中國人民志願軍歷史上的27個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頁329。

⑲ 《中國人民志願軍歷史上的27個軍》，頁329。

⑳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提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地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各地應即展開關於目前時事的宣傳運動」。參見〈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運動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203-207。

㉑ 關於當時社會上開展的「抗美援朝」宣傳動員，參見侯松濤：《全能

政治：抗美援朝中的社會動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㉒㉓ 〈總政治部關於整風工作指示〉(1950年10月25日)，載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十一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0)，頁415；415-16。

㉔ 〈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批語〉(1950年7月7日、8日、1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頁158-59。

㉕㉖ 〈毛澤東談中國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1970年10月10日)，《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頁13。

㉗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頁490-91。

㉘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205。

㉙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編委會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頁21、22。

㉚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爭史》，上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頁158。

㉛ 秦程節：〈浴俘：新式整軍運動中「解放戰士」思想改造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2期，頁17。

㉜ 王琴：〈抗美援朝片段〉，載楊隆昌編撰：《老兵回眸——抗美援朝親歷記》(桐梓：內部資料，2002)，頁129。

㉝ 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17。

㉞ 饒弘範：《抗美援朝戰地日記》，頁3。

㉟ 《中國人民的勝利》是由北京電影製片廠與蘇聯中央文獻電影製片廠於1950年聯合攝製並公映的彩色紀錄片。該片「系統地介紹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軍事鬥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鬥歷程」。參見吳保和主

編：《華語紀錄片手冊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頁22。

⑳㉑㉒㉓ 宋崇書：〈出征朝鮮〉，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六枝特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六枝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六枝：內部發行，1995），頁15-16；15-16；15-16；21-22。

㉔ 謝受康：《和平之神》，頁14。

㉕㉖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頁634；635。

㉗ 參見大鷹：《志願軍戰俘紀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頁15-16。

㉘㉙㉚ 常成：〈「新中國」的叛逃者——韓戰反共戰俘的生死逃亡路，1950-1954〉，《漢學研究》，第34卷第2期（2016年6月），頁273；245-80；276。

㉛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309。

㉜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艱難決策過程，參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頁278-317。

㉝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頁26。

㉞ 魏巍：〈我怎樣寫《誰是最可愛的人》〉，《人民日報》，1951年8月19日，第3版。

㉟ 1950年5、6月，周恩來在政務院政務會議上多次談到軍隊復員問題，從中可知，截至1950年5月，「全國軍隊人數為五百二十萬」，「以軍隊的成份說，解放戰士〔即原國民黨官兵〕佔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周恩來傳（1898-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884。

㊱ 楊奎松：〈大歷史，小道德〉，載《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151。

㊲ 志願軍曾多次補充新兵。例如1950年12月12日，周恩來上呈給

毛澤東的一份報告提到：東北已經集訓了十一萬新兵，其中七萬人將於次年1月中旬補充進朝鮮戰場上的前線隊伍。參見〈關於志願軍兵力和裝備補充等問題給毛澤東的報告〉（1950年12月1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625。1951年9月中旬，為解決運輸難題，中央軍委決定為志願軍鐵道兵團補充九千名新兵，並臨時配屬五個新兵團；1953年3、4月，志願軍補充了九萬名新兵。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簡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頁461、483。

㊳ 黃穗生：〈抗美援朝時期廣州青年參加軍幹校始末〉，《廣東黨史》，2007年第4期，頁39。

㊴㊵ 程幹遠：《親歷韓戰——中國軍人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13），頁28-29；29-36、41。

㊶ 軍事幹部學校簡稱「軍幹校」，是指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屬的空軍學校、海軍學校及各特種兵學校。1950年12月1日，中央軍委和政務院聯合決定，各地政府要配合完成這些學校在全國各地統一招生工作。凡年在十七歲到二十五歲，思想純潔，身體健康，具有初中二年級以上的文化程度的青年學生及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均可自願報名參加。參見〈中央軍委、政務院關於招收青年學生及青年工人參加各種軍事幹部學校的聯合決定〉，《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日，第1版。這一決定得到全國各地青年的積極回應，掀起了一股踴躍參加軍幹校的熱潮，許多符合入學要求的青年新兵在軍幹校學習，畢業後被補充進志願軍隊伍。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爭史》，中卷，頁146-52。